

第三節 勞改生產的新格局

一九八〇年，勞改系統開始自上而下的推行企業財務大包幹，並開始部分勞改隊試行「管教，生產雙承包責任制」，於一九八四年七月召開的全國勞改，勞教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提高經濟效益，扭虧增盈」的要求，在全國勞改系統全面實行「管教，生產雙承包責任制」（簡稱「雙包制」）。

（一）「雙包制」的內容及目的

根據勞改隊歷來的雙重任務——既有改造罪犯的政治任務，又有創造財富的經濟任務。即兩項指標：

管教指標為：犯人的逃跑和捕回率，發案及破案率，非正常死亡率，在勞改隊內違反紀律和重新犯罪率，以及文化，技術的入學合格率，勞動出勤率。

生產指標為：勞改隊的生產產值，產量，質量，成本，消耗，利潤等經濟技術指標。因勞改企業有其特殊性：勞動人員不能固定，勞動力素質不能選擇，勞動的時間，地點，條件有所限制。所以，各經濟生產部門對勞改企業的生產指標要求較同類型地方國營企業低二十％。

把管教及生產指標分層下包到各大隊，各中隊，各小組，以至個人。對公安幹警及犯人都具有兩種指標的具體要求。

勞改企業的生產利潤按一定比例交納各種稅收和費用。剩餘的利潤由勞改企業自行支配。支

配方式一般實行「三三四制」。即三十%用於擴大再生產（技術設備投資），三十%用於改善企業生活條件（為企業公安幹警修蓋房舍，辦學校，托兒所補貼等），四十%為獎金（主要給公安幹警，犯人只有少許獎金）。勞改生產的利潤多寡與公安幹警的本身物質利益直接掛勾。公安幹警的工作好壞由利潤推動。犯人談不上獲得物質利益，而是在暴力壓迫下勞動，以取得「改造表現好」，換取減刑等實際利益。

勞改企業，撇開專政這一方面來說，作為一個生產單位，它具有同其他社會主義國營企業所具有的通病：生產效率低；生產成本高；無人負責；沒有創造力；沒有經濟效益，即「鐵飯碗」，「大鍋飯」等等。

「雙包制」的目的是確保鎮壓職能正常運作下，調動兩種積極性：即公安幹警的積極性和犯人的積極性。為中共政權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

一九八三年起，在勞改企業中實行支隊長（監獄長，所長）責任制。把責任，權利和利益三者結合起來的一種勞改隊管理方式。以物質利益——獎金推動勞改工作，而不是過去一味強調政治因素。進一步提高奴役性生產在社會主義國民經濟中的作用。

（二）「雙包制」的作用

在雙包責任制的推動下，各勞改隊獨立自主的制訂了五花八門的辦法和規定，目的是完成兩個指標，促進本勞改企業的生產發展，從而得到現實的物質利益。中共一些的媒介材料充分肯定這項制度的成績。數例如下：

1. 據浙江省司法局報導：一九八五年全省勞改企業實行「雙包制」後，調動了公安幹警和犯

人（包括勞教，就業）的積極性。其效用為：勞改隊內重新犯罪率及逃跑率下降；一九八五年上半年勞改工業生產總值比一九八四年同期增加五十七%，利潤增加三十五·八%；長期虧損的勞改農業單位大為減少。

2. 河北省勞改單位一九八四年推行承包責任制以後，工業產值比一九八三年增長四十%，利潤上升六十%，獄內秩序明顯好轉，犯人逃跑率下降到歷史最低水平¹³。

3. 河南省五二農場，有土地面積六·八八萬餘畝。過去，該農場長期存在犯人逃跑多，經濟虧損比較嚴重的現象。自一九八二年實行「改造，生產雙承包」後，一是犯人逃跑率下降，一九八〇年為五%，一九八四年為〇·三四%；二是生產迅速發展，一九八四年夏糧達二一八〇萬斤，比一九七八年全年產量增長三十八%；三是產值大量增加，一九八二年工業總產值達一億元，比一九七八年增長五十二·七%；四是由一九七八年平均虧七七萬元到一九八三年盈利一五五萬元¹⁴。

4. 萊陽勞改支隊(LRC-21-23，山東省，烟台市)，在一九八四年組建，實行「雙包責任制」後，自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七年犯人違規率由千分之七降為千分之一點八。獄內發案率由千分之二點三降為千分之零點六。申訴率由千分之十三降為千分之零點五¹⁵。五年來，產值，利稅，出口創匯額分別以二十八·五%，四十八·三%，四十三%年平均速度增長，有兩種產品得「省優」，「部優」稱號，有兩種產品外銷東南亞，西歐及美國等二十多個國家¹⁶。

近十年來，在鄧小平經濟改革的主導下，勞改生產亦作了很大的改革，一個特點是勞改生產商品化，另一個特點是鼓勵勞改產品出口，甚至發展與外國資本的合資企業。前述「朝代」牌葡

萄酒是一例。傳聞歐美的「富豪 VOLVE—吉德 CHINTER」又是一例。

三種經濟形式勞改生產的變革：

第一種是主要在五十年代進行的，如修建水壩、鐵路、開荒、築路等。這一類生產難以金額估值。奴役勞動的形式十分原始，不需要多少資金及技術的單純的繁重體力勞動。近十年來已大為減縮。目前在青海，新疆等省較多。

第二種是農業形式，因為農業生產價值很低，犯人強迫勞動所得僅能支付勞改隊的部分開支。所謂勞改隊的開支是包括勞改隊的公安幹警的所有費用（即工資、裝備、服裝、津貼、住房等）。所以中共一直認為在經濟上，農業性勞改隊是虧本的。近十年來，一再要求轉虧為盈。主要措施是推行「雙包制」^{①7}及改變「以糧為主」生產形式，調整產業結構，在農場中大力發展工副業。例如奶製品廠，製磚廠，釀酒廠，木器廠，養殖業等，至一九八七年，全國五分之二的勞改農場轉虧為盈；場辦的工副業產值在農場總產值中由四十七%上升為六十%。中共表揚了二個典型，一個是江西省的珠湖製藥廠（LRC-09-09），另一個是上海設在安徽的第二勞改總隊中的白茅嶺閥門廠（LRC-29-11），它們年產值都在三千萬元以上，每年給政府上繳六百萬元利潤，其產品供出口。

目前來說，勞改隊還是以農場形式為主。原因是一方面可容納較多的人，並易於強迫勞動。另一方面，由於農業產品還是中共的大宗出口物資，而勞改隊的農業產品占的分額不小。如大米、棉花、茶葉、水果、生豬等。據報導，勞改隊三大傳統出口農產品：水果、茶葉、生豬，所得外匯一九八七年較一九八四年增加五十%^{①8}。

第三種是工業形式。這是近十年來，中共大力推動的。據報導，自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三年七年內，勞改工業總產值每年平均為二十五億八千萬元（一九五二年僅二億多元）¹⁹。已有二十四個勞改隊達到了中共的二級國家企業標準。並且許多產品在國內、國際上很有名聲。據報導：勞改隊有近八十種產品出口，占勞改隊所有工農業產品總數的四十%多。目前主要的出口商品為機電，化工產品，部分農副產品²⁰。

中共近五、六年來，在勞改隊中推行一種教育制度。這種教育含有兩大內容：一是政治思想，法律制度方面的，強迫灌輸社會主義思想及觀點，中共的法律知識；另一是文化、技術方面的，結合該勞改隊的生產性質，對犯人施行文化及技術訓練。雖然，把勞改支隊，監獄，勞教所辦成學校的觀點，早在六十年代由毛澤東對美國人斯諾的講話中提出，但並未得到系統的貫徹，如今由鄧小平加以系統化、政策化。所以目前一部分勞改隊因貫徹這種教育制度較好，而獲得了第三個名稱：××省（市）××學校。例如山東省生建摩托車發動廠（LRC-21-05）又名山東省泰山育新學校。

這種教育制度的政治目的是顯見的，另一方面是要從勞改生產中得到更多的錢，除了使用各種手段強制勞動外，必然要使勞動者掌握一定的技能，所以比較注重犯人的技術學習。凡有技術的犯人亦受到一定的重視和利用。

實施「雙包責任制」以來，勞改隊的控制更嚴酷，勞動強度增大，同時，引起的反抗更為激烈。下面實例是中共勞改隊歷史上鮮見的。

一九八九年二月八日，新疆自治區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南緣圖木休克墾區。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農三師所轄勞改五中隊，有六名自湖南省押送來的犯人：段建成，劉善保，伏瑞陽，鄧維斯，歐世雄，徐志平等六人（其判刑刑期分別為二十年，二十年，十七年，十五年，十年，九年。）宣稱：「……有些傢伙太不夠意思了，靠攏政府當先進，還出賣我們……」「今年中隊搞承包，看得緊，混不了，逃不脫，我們不如多殺幾個人，死了算了……」，他們用匕首，榔頭，斧頭把六名犯人「勞改積極分子」殺死，又綁架兩名公安幹警（殺了其中一名），企圖待天黑逃跑。但被勞改中隊其他犯人報告武裝警察，獄區被包圍。經請示北京司法部，新疆自治區政府及公安廳，新疆武警總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新疆軍區後，調配幾百名武裝警察，車輛及直升飛機，由司法部長蔡誠，副部長金鑒下令鎮壓。暴動的六人中，一人被打死，二人自殺，三人被捕，隨後槍決。共歷時十八個小時。（請閱〈西部大暴獄覆亡記〉《法律與生活》，北京，法律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九月，第二十二—二十三頁）。這個事例反映了：一、新疆（及青海省）地區被押進了大批內地省籍的犯人，這些遠離親人及家鄉的犯人，極易鋌而走險；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各師都設有勞改隊，這些勞改隊中以重刑犯為主，這些人幾乎肯定將一輩子流徙在荒漠之中，故常常作絕地拚搏。三、他們首先殺死的是同獄的犯人，因為這些人不同程度地在勞改政策鼓勵下成為獄方的工具，他們監視，逼迫，毆打，出賣其他犯人，他們被仇恨的程度更大，更直接。